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探析

赵佳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0031)

摘要: 思想作为一种观念表达,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它是多方汇聚的结果。我们研究某种思想,必然会研究构成该思想的若干门类。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的思想是党关于和平实践的思想指引,其发展成熟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中国传统和平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综合效力。本文探讨重点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和平思想的理论开创、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的讨论,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平思想与和平发展实践寻求更多思想理论滋养。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关于和平问题的系统论述,但在一系列往来书信、报刊文章、历史事件评论中形成了内涵丰富、辩证精辟的和平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出发,将实现和平作为揭露资产阶级虚伪本质、实现无产阶级最终解放的重要方式。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和平思想的理论开创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通过论证“和平是人的本质需要”、“揭露资产阶级的虚假和平”、“构建无产阶级政党和和平思想的雏形”二个层面开创与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和和平思想。

第一,揭露战争爆发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分析战争爆发的根源来阐述和平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战争爆发是对和平的破坏,并以此揭示和平的本质。前文已经指出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激烈矛盾,并且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阶段时,外在表现为暴力战争,这是破坏人类和平稳定的根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引发战争的根源,其中矛盾的产生又源自于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的阶级斗争。即是说,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阶级产生——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战争爆发的过程破坏人类社会的和平。其中,因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而划分了不同的阶级,阶级产生导致私有财产争夺日益狂热化,战争必不可免登上历史舞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讲,在政治、宗教、哲学或者任何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矛盾和冲突,都是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即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所导致。这样的准则同样适用于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交往的和平状态。只要存在阶级,有经济利益的冲突,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人类战争就难以避免。

第二,构建无产阶级政党和和平思想的雏形。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和平思想的开创,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内涵。

其一,和平作为人类不同利益主体间非暴力的交往方式,根本旨归在于扬弃阶级斗争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暴力(战争)与非暴力(和平)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交往方式,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出于政治、经济等价值需求的路径选择。不同于暴力战争的破坏性威胁,和平利用相对缓和的斗争方式在矛盾对立中寻求彼此的平衡。这种平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不同阶级争取物质利益进行相互斗争的缓和状态,即是不同阶级在追求自身利益而进行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对立状态缓和的“相对和平”。恩格斯指出:“只要人民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胜利,他们绝不会去呼吁‘拿起武器’,然而一旦人民被挑动起来

举行起义,即使胜利的机会极少,他们也要进行搏斗。”^[2]基于工具性角度来讲,和平与暴力方式的抉择,关键在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哪种方式付出的代价更少,哪种方式能够为所代表阶级获取更高的利益。事实上,和平往往比暴力更能够以较少代价取得较高的利益,成为阶级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突破口。这种利用阶级斗争缓和取代阶级斗争对立的交往方式,实质上是列宁所提出的通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相处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和平共处”的价值取代“暴力对立”的价值,从而实现了阶级斗争“对立”价值观念的扬弃。

其二,和平作为处理国家、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近代民族的形成,以及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发展壮大的。以实现资产阶级利益为诉求的近代国家、民族间关系实践承认战争的合理性,将战争作为推广民族、国家意志的有效手段,逐步建立起一套漠视和平、充满矛盾对立的国际交往机制。马克思恩格斯强烈反对旧有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批判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和平实质上是借助“和平”的口号掠夺无产阶级财富,利用“战争”等压迫无产阶级的方式实现对世界秩序的统治。通过对资产阶级政府“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3]本质的揭露,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4]这样,无产阶级致力于建立的未来自新社会将以和平作为处理国家、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并以和平作为新旧社会过渡期间化解矛盾冲突的有效实践模式。该意义上,强调和平对于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价值,集中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是加速历史向前发展,构建人类真正永久和平的重要保障。

二、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主要是通过揭露帝国主义的虚假和平,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重要论断来实现。

第一,帝国主义所宣扬的和平具有虚假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列强进入帝国主义发展时期。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垄断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霸权竞争,彼此矛盾不断激化,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时期,无产阶级关于和平的思想更加成熟。正是不断深入的对帝国主义虚假和平进行分析和批判,列

宁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历史性论断。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现和平共处。十月革命后,人类历史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共存局面。结合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的事实,列宁在《和平法令》中表示,苏维埃政权愿意同一切交战国缔结“无割地、无赔款”合约,体现出列宁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的“和平共处”原则。事实上,列宁认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当时,帝国主义针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从政治到经济等多个方面的敌对政策。这成为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主要指,在远离战争的和平国际环境中,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积极拓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开展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通过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进而提高自己的政治实力。如此,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才能不断发展与进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平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历史时期为巩固世界和平起到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否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长久性。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进行研究。按照流派区别,我们可以大致将相关研究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其代表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创造性的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作出了重新诠释。彼时青年卢卡奇通过对历史及其主体以及物化问题的澄明,论述了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历史作用。尽管晚年卢卡奇没有停止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修正和批评,但著作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初步探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持久和平的方向却是不争的事实。晚年卢卡奇在理论研究中主要有“马克思主义革新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三大理论创新,相关论述可见于《民主化的进程》、《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及其谈话中。历史和社会发展作为一种“总体性”存在,反映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总体性革命达到反抗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压迫。该意义上讲,这种力图改造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中追求未来理想和平社会的原始助力。科尔施后期在《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论著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是积极改造现存世界,这一改造过程必须通过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这样,科尔施通过不断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性,论证了无产阶级通过彻底革命斗争实现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理论可行性。总体来讲,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与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滥觞,对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尽管卢卡奇与科尔施的相关理论存在着不足之处并引发了长期的争议,但这些理论作为可

供参考的思想资料,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演进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个阶段,20世纪20—30年代发展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的发展与实践。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分支,以批判的社会理论闻名于世,其代表人物有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通过借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建构起一套系统批判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其中,哈贝马斯借助于分析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弱点,力图建构一个可操作性的“规范基础”——交往行为理论,以此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终极转型。成熟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积极聚焦社会现实问题,扭转早期沉醉于工具理性批判的囹圄,提倡批判现存秩序,鼓励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追求人类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实践,实现人类终极和平与自由。

总体来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传统生产方式的批判,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以此探索解决社会发展危机的途径。这些探索和努力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回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研究与人类思想文明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以青年卢卡奇、科尔施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以“总体性”为出发点论证无产阶级革命重要性的策略,但是其解释进路和思维模式并没有深入分析“总体性”本身,因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性质。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上缺乏辩证的态度,仅是维护纯粹思想领域的“革命活动”,并非彻底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框架,因而成为该学派不可逾越的界限。第三方面,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发展之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理论上的局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因素作为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将生态危机当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危机,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凌驾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上、对人类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要矛盾,实质上是一种理论研究的舍本逐末,忽略了人类社会真正走向和平的永续发展之根源。尽管存在着不足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相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的发展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事实上,本文研究正是借助于前人擎起的巨擘,探究人类未来和平发展的生长点与路径走向,对相关理论领域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且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70.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0.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1.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7.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